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追忆廖公

资中筠

近来我在回忆往事时脑海中经常出现一个人的声音笑貌,那就是廖公(廖承志)。廖承志一家是革命世家,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廖公本人也是传奇人物。关于他的显赫生平、杰出贡献和一生行藏,已有多传记和无数文章,还有他自己的文集在,轮不到我来赘言。只是几十年来,我在工作中与他接触较多,所以有一些近距离的体验。他是我所接触到的老革命高官中色彩最丰富、最率真、最有赤子之心,也是最“好玩”的,堪称性情中人。

我初识廖公约在上世纪50年代前期,那时在我工作的圈子里,不论老少都已称他为“廖公”(其实那时他还不到50岁),只有周恩来总理称他为“小廖”。

我的印象,他与“道貌岸然”绝对无缘,大多数时候是嘻嘻哈哈,似乎无时无刻不在找点题目开玩笑。下级向他汇报工作,他也常常没正经话,有时拿腔拿调地学着他(她)的口吻说话,而且常给人起绰号,不叫名字。例如有一位姓梁的男同事,他就学着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腔调叫他“梁兄”,从不叫名字。

开会时他似乎在笔记本上记录,实际是在画人物漫画,不论中国人、外国人,几笔勾勒,惟妙惟肖。他日文很流利,交流自如,英文也很好,完全可以自理,不过重要谈话他还是愿意通过翻译。他是急性子,而我年轻时以反应快见长,所以我跟着他的时候居多。他对内对外从不打官腔,有他自己特有的词汇,在争论时谈锋犀利,没有虚词和教条,而又幽默风趣。一些西方人既怕他,又喜欢他。哪一次会议“Mr.Liao”没有来,他们都会有点失落。

廖公在掌握政策上总是趋向



1908年,廖仲恺、何香凝和子女廖梦醒、廖承志合影。



廖承志

于灵活、务实,对日本工作尤其如此。直到“文革”以前,在他主持对日工作时,严格把日本极右派与其他各界、各派日本人区别开来,依靠几员“知日派”得力干将,对日本人民做了广泛的团结工作。那时虽然中日没有外交关系,但是与日本的民间友好往来以及经济关系从来没有断过,这为以后形势转变时顺利建交打下基础。这当然与当时中央的决策和周总理亲自掌握有关,而廖公在其中的特殊作用功不可没。

但是在中苏交恶后的“反修”斗争中,对待苏联,他是当仁不让的。我感觉他对苏联有好意见,在“牢不可破”时期,我见到过私下流露对苏联的微词,只有他和李一氓(老一輩无产阶级革命家,曾任中联部副部长——编者注)。

他们都不满意“老大哥”的颐指气使,而且对有些政策问题有自己的看法。我听廖公说过,过去在延安时,“我们”追随苏联的政策,做过不少错事。例如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被苏联诬陷为“国际间谍”,驱逐出境后曾想来延安(她第一次访延安后,曾写过盛赞延安和中共的文章,这是她得罪斯大林的一个隐蔽的因由),遭拒绝。当时在延安新华社工作的美国人李敦白受斯特朗的牵连,也被打成“特务”,中共根据苏共的要求,把他逮捕入狱。廖当时是新华社负责人,亲自经手办理此事。李敦白新婚不久,的中国妻子只好离婚。所以廖提起此事时,说自己干了一桩“缺德事”。

他尽管开会时总似不大专注,但是在关键时刻反应很快,做

决定、下指示都是当机立断,很少犹豫。1962年“世界和平理事会”斯德哥尔摩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第一次退场以抗议苏联代表对民族独立运动的讲话,标志着中苏在“和运”中公开决裂,就是他带的头。我当时从后面的翻译箱中能望见中国代表团的座位,只见廖公忽然一甩,站起来就走,整个代表团连忙跟着都起身走出了会场。这是先斩后奏,“退场”并不在出国前的“预案”之中,不过中苏争论已经公开。事后他和刘宁一(代表团另一位领导)一起,半开玩笑地告诫中国团员说:“退场可不能轻易退,你们以后可别开会开错了就退场,好回国打桥牌,那可不行!”我体会,这里进退的掌握,也是一种艺术。

他一生经历无数惊涛骇浪,听他闲聊是一大享受,但是他很少讲革命经历、战斗故事,只自称是“国际坐牢专家”:各种监狱共坐过7次——日本3次,荷兰1次,国民党2次,长征路上做张国焘囚犯1次(后来“文革”期间为周恩来特殊保护软禁5年,他自称算“半次”),几番九死一生。记得他讲过在张国焘那里当囚犯,本属于被杀之列,是他的画画才能救了他,张需要他画宣传画,才暂时留他一命,铐着手铐走长征路。后来周恩来来到张国焘那里,巧妙地

把他救了下来。

廖公在两个人面前绝不敢顽皮,一位是他的母亲何香凝老人,一位就是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对他特别严格,真像对晚辈一样,随时耳提面命。有一次,在为斯特朗祝寿的宴席上(赫鲁晓夫为斯特朗平反后,1958年斯特朗来中国定居直到去世),周总理在谈话中提到当天从《参考资料》上刚刚看到的一篇重要文章,立刻转身问“小廖”看过没有,廖公称还没有来得及看。周立即不悦,严厉地说,这样重要的文章你不及时看,是不是又在看那些花花哨哨的外国杂志?接着转向经普椿说,以后你注意给他床头放点正经的材料,把那些杂志拿走。经普椿说,我管不了这个。周说:“你怎么能不管这个,难道只管生活?”廖只有恭恭敬敬地听着。我觉得周总理对廖特别严,正是对他特别信任和看重,爱之深而责之切。廖在周面前像小学生,挨批评以后,回头向别人吐吐舌头。

还有一位与廖关系非同一般,廖对她绝对尊重的人是宋庆龄。我没有亲眼见过他们二人在一起的情景,但听说只有廖是能随时登门见宋,宋待他如子侄,也最信任他。后来,经过几次政治运动,大概廖成为宋唯一可信任的人了。所以“文革”期间,廖公也被“打倒”批斗,宋是一大打击,据说从此她闭门不见任何人。

1983年,我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时惊闻廖公去世的消息,黯然神伤许久。他才75岁,不能算老,在中国刚刚开放的关键时刻失去这样一位人物,其损失是很难以弥补的。

(摘自《资中筠自选集》,有删节,该书已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11年出版)

《中国行日记》

1974年春天,中国正处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学者罗兰·巴尔特随法国代表团在20多天中访问了北京、上海、南京、洛阳和西安等城市,参观了各地的重点景物、历史古迹以及学校、医院、人民公社和工厂。在这段充满神秘色彩的旅程中,罗兰·巴尔特写了3本日记,详细地记录了他在在中国所见到的人和事,并加入了较为个性化的评价,本书即是对这3本日记的总结。作者罗兰·巴尔特,系法国著名结构主义文学理论家与文化评论家,并被公认为是自蒙田以来法国最杰出的散文大家之一。

([法]罗兰·巴尔特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1月出版)

《中国人应知的古代军事常识》

本书选用近200个条目,以问答的形式简单梳理了中国古代军事发展脉络,在条目的选择上遵循影响力原则、知名度原则、纠错勘误原则,文章通俗易懂,纠正了长期以来文艺作品中军事史上一些人物和事件的错误,使此书知识性和趣味性兼而有之。

(赵志超 编 中华书局2012年1月出版)

《动物记》

本书精选了60位中外名家100篇关于人与动物之间关系的佳作。这些作品从多种角度直击人的灵魂,拷问人类的罪与罚、责任与义务、道德与良知。相信读者自会从中感受到精神的震撼,进而升华为对所有生命的理解与尊重、悲悯与善意、感恩与敬畏。一篇篇感人肺腑、发人深省的文字配以丰子恺先生的画作,可谓图文并茂、相得益彰。

(星云大师 等著 丰子恺 图 作家出版社2011年12月出版)

《刀下留人》

本书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的前院长,有“香港内窥镜之父”的美誉。在这本书里,这位经验丰富的医生以轻松有趣的笔触叙述着自己行医治病经历,记录了他行医30年过程中所经历的乐趣、憾事和怪事。几十则小故事轻松风趣,表现了医生、病人面对疾病、死亡的态度,也向读者展现了“医生”这个圈子中我们所不熟悉的万事万物。这些故事有些令人忍俊不禁,有些令人目瞪口呆,有些则令人黯然神伤,但作者自始至终传达的都是一位医者仁心的工作态度和理念。

(钟尚志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1月出版)

《今朝风日好》

董桥,1942年生,福建晋江人,曾任香港《明报》总编辑、《读者文摘》总编辑,撰写文化思想评论及文学散文多年,出版文集10多种。在这本书里,董桥会带领读者走进他的书房,听他讲述搜集古书旅程中的故事,清纸文字作看的是访书藏书,或是文人闲话,细细读来就有三三人物翩翩而出:书商威尔逊、史湘云、苏二小姐……前尘旧梦,他乡故文,惹人情怀。令作者念念不忘的,其实是书里面所凝聚着的、那些不会再来的时光。

(董桥 著 广西师大出版社2012年1月出版)

《燕京旧日》

本书是漫画家李滨声以20世纪40年代的老北京为对象的一组民俗画作,反映的是北京城市的风貌民情。全书以“画”为主,以“话”为辅,本着亲闻、亲眼、亲历的原则,在读者眼前展开了一幅老北京世相民俗的时代画卷。

(李滨声 绘著 中华书局2012年1月出版)

《流沙河诗话》

流沙河,生于1931年,是著名的诗人和学者。在这部作品中,作者写了他一生习诗、读诗的心得,其论述广泛,从诗人先天的资质到后天的培养,从写诗言情到咏物论史,从立意构思到谋篇造句,从韵律辞章到比兴托物,从诗的修改鉴赏到诗的选篇与评论等,都侃侃而谈、信手拈来。

(流沙河 著 新星出版社2012年1月出版)

《剪纸的故事》、《文爱艺诗集》入选2012年“世界最美的书”

据新华社消息(记者孙丽萍)近日,记者从上海市新闻出版局获悉,2012年德国莱比锡“世界最美的书”评选刚刚结束,由中国选送的《剪纸的故事》和《文爱艺诗集》双双荣获“世界最美的书”称号,分别斩获银奖和铜奖。

据介绍,参加今年“世界最美的书”评选活动的共有31个国家和地区,参评图书达540种,其中14种获得了“世界最美的书”称号。《剪纸的故事》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该书在素白的封面上凹现出剪纸的动物图形,传承了

中国斑斓多彩的剪纸文化,被评价为“多彩而有趣”。《文爱艺诗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整体设计以个性简洁取胜:红色的文字从封面流淌到封底,充满视觉冲击力。

“世界最美的书”评选活动每年在德国莱比锡举办,中国自2004年起由上海市新闻出版局牵头组织参加此项活动。“中国最美的书”评选是参评“世界最美的书”的重要环节,面向全国征集参赛作品,于每年11月举办,评委由中外业界专家或学者担任。去年有20本书籍入选“中国最美的书”。

《共和之殇》出版

本报讯 近日,由军旅作家刘秉荣创作的历史纪实作品《共和之殇》由群众出版社出版。

中华民国初年,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果实,复辟帝制,孙中山发动领导二次革命失败。这一时期,复辟闹剧两次上演,民国大总统六易其主,国会内阁斗争不断,法律规章朝令夕改,孙中山理想的“共和之国”走向夭折。据悉,刘秉荣自1980年以来即对民国历史着力研究,已先后出版了《辛亥革命秘史》、《天变》、《国民

政府秘史》等几部反映民国历史的作品。这部作品是他的又一新作。谈到创作此书的初衷,刘秉荣说:“关于辛亥革命已经有大量的图书来描述、评论,但是关于辛亥革命到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的历史,却鲜有作品记录,我的着力点正在于此。”另外,为了增强这部纪实作品的历史厚重感,书里还记录了大量的军事行动、往来信函、电报、人物对话以及演说等,其中许多史料鲜为人知。(雷冰)

宁波:家有闲置书可送图书馆

本报讯 春节长假,忙碌一年的人们有时间猫在家里整理旧物了。一些宁波市民表示,他们整理出一批旧书,觉得扔了或当废纸卖了怪可惜的,想给这些书找个出路。浙江省宁波市图书馆考虑到这部分人群的需求,在图书馆一楼大厅设了一个爱心捐书箱,专门接收市民捐赠的图书。据悉,这一活动已持续了五六年。据该馆工作人员介绍,如果捐赠的图书量少,可以直接投进箱子里,如果捐赠量比较大,还

可跟市图书馆联系,由工作人员上门接收。市图书馆会对市民捐赠的图书进行整理、分类,定期整理出一批旧书,觉得扔了或当废纸卖了怪可惜的,想给这些书找个出路。浙江省宁波市图书馆考虑到这部分人群的需求,在图书馆一楼大厅设了一个爱心捐书箱,专门接收市民捐赠的图书。据悉,这一活动已持续了五六年。据该馆工作人员介绍,如果捐赠的图书量少,可以直接投进箱子里,如果捐赠量比较大,还

2012年国际城市蓝皮书指出——

文化正成为促进都市发展的全新引擎

本报讯(记者李静)中国首部国际城市蓝皮书《国际城市发展报告2012》近日在京发布,该书是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的。

该蓝皮书指出,近期以来,城市文化正成为促进国际大都市发展的全新引擎。对于城市发展而言,如果说以往的文化建设起到的更多的是类似“花瓶”的作用,是体现繁荣的配角,那么在未来自一个阶段,文化对于城市的意义将更多体现在实际的要素推动乃

至于城市发展“软实力”的表现上。有关研究反映出,文化的投资乘数(是指投资引起的收入增加量与投资增加量之间的比率)高于一些公认的高增值行业。新加坡国立大学商业研发中心对于新加坡产业发展的一项研究发现,文化创意产业的投资乘数达到1.66,高于银行业(1.4)和石化工业(1.35)。美国学者的研究更发现表演艺术的投资乘数可以达到2.03。

蓝皮书认为,在城市向以知识经济为核心的发展模式转变过程中,文化起着决定性的基础作用。城市文化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城市的创新能力与创新氛围的塑造。同时城市文化的发展已经逐渐超越狭义的文化领域,向产业、基础设施、社会、城市复兴,乃至城市总体定位渗透,文化的关联度大为延展,逐渐成为促进城市各功能发挥合力的“黏合剂”。

拾音阁

“漂二代”的文学形象

张颐武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的农民工问题又有了新的现象,就是这些已经进入城市的农民工的“二代”已长大成人,作家王昕朋的最新长篇小说《漂二代》正是对于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表现和探讨。

所谓“漂二代”,是作者对于已经进入城市的农民工的第二代的概括。这部小说通过对于几个农民工的“二代”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挣扎,写出了当下中国发展所面临的这一现实问题。在这部小说中,作者用生动的笔触表现了几个“漂二代”在城市中的挣扎、奋斗、迷茫,写出了他们在沉沦和奋进之中的多重困扰和挑战。小说生动地刻画了形形色色的人物,他们在城市中的感情、欲望、行动被作者写得异常真切和生动。

这部小说的真正价值,在于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复杂中国”的形象。今天的中国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中涌现了无数机会,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其中,城乡之间的差距一方面当然体现在城

市与乡村之间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中严重的不平衡状态。人们常说,中国的超级大都市和二线城市的发展都已经达到或接近了发达国家的水平,但乡村还明显地远远落后。另一方面,这种不平衡状态其实更体现在伴随着中国的变革出现的从农村移民到城市的新移民。中国的发展特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出现的“离土离乡”不同,而是“离土不离乡”,通过户籍的管理使得原有的农民身份和户籍仍然保留,而在他们所进入的城市则始终是一个难以融入的“外来者”。这一问题的症结所在是中国的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需要大量的新增劳动力,他们是中国30年高速发展的内在动力,而中国城市的状况又难以让这些劳动力彻底融入城市之中。

农民工其实是城市生活的重要元素,中国的高速发展和城市的运行都极度依赖农民工,“中国制造”的全球性影响和中国内部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

他们的贡献,但另一方面他们的身份认同和诸多具体的生活问题都难以得到现实的解决,他们既无法回归乡村也难以融入城市,在夹缝之中生存。

这样的困扰一直存在于中国当下的社会之中。农民工的“二代”则从未在农村中真正生活过,从出生时就生活在城乡身份的夹缝之中,感受到巨大差距和身份认同的困扰的同时,也被城市的物质消费所诱惑,为互联网和都市生活中的诸多迷人现象所吸引,农村对于他们是抽象的,但城市对于他们这些在城市外国和边缘游走的人来说,又是模糊的。这种“漂”的感觉被作者写得相当生动和真切。作者以一个充满同情的观察者的角色,对于那些再也回不去农村的年轻人充满无限的关爱,同时又有冷峻的观察和客观的剖析,从而在虚构中展现了中国在复杂的变化中的真实。正是在这个角度上,这部书具有着独特的价值。

(《漂二代》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2012年1月出版)

